叢書總序

/ 沈志華

「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末。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中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階段，1980 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本特徵 —— 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 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1] 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 年 5 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479 頁。

序　言

本書的研究課題是考察 1949 年至 196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蒙古」）[1] 關係的歷史。一方面，這段時期內，中蒙關係經歷了由建交到不斷發展及至「蜜月」並最終轉冷走向「冰封」的過程。另一方面，同處社會主義陣營，此段時期中蒙關係的重要特點是兩黨黨際關係與兩國國家關係的交互疊織。此外，中蘇關係發展變化對此時期中蒙關係也有重要影響。筆者的主要研究目標是，在充分發掘使用中國、蒙古、俄羅斯三國解密檔案和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梳理此段時期內中蒙關係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解釋此種歷史過程所呈現出的歷史現象，最後分析該時段內中蒙關係波折變遷的影響因素與經驗啟示。研究這一時期的中蒙關係歷史有着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學術意義上來講，當代中蒙關係脫胎於清末民初。辛亥革命肇建民國與外蒙古獨立同時發生。這是亞洲近現代史令人矚目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因各當事方立場不同，相關研究見解互歧，加上冷戰時期意識形態對峙，學術研究一度成為政治論戰的附庸，中蒙歷史關係研究領域長期徘徊在冷戰思維不能自拔。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開始有了一些新的研究視角，但是一方面舊思維的慣性仍體現一些研究成果中，另一方面有些結論已經固化。

而隨着相關國家檔案資料解密，學者開始獲得更多歷史信息。國外學者利用新解密的檔案資料對中蒙關係歷史有許多新的解讀，極大地豐富了此前的認識。儘管筆者並不完全贊同，但對於重新審視中蒙關係歷史有相當的刺激和啟發。如何打開新的研究思路，構建以大歷史觀審視中蒙關係歷史的認知體系，這是推動我們學術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然而，事實上，除了一些相關的專題研究論文和學位論文之外，國內學術界至今還沒有一本基於第一手的多國多邊檔案文獻材料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蒙關係歷史的專著。因此，本書所涉的研究主題既有相當的迫切性，也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從現實意義上來看，蒙古作為中國周邊陸地鄰國之一，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通道的中轉國家。蒙古也提出了「新復興政策」，力圖通過「過境蒙古」等系列舉措發展本國經濟，並且愈加重視對華關係的開展。因此中蒙關係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實現中國同周邊國家和諧共贏發展的重要雙邊關係之一。為了實現中蒙關係更好發展，就需要從中蒙關係的歷史當中汲取經驗。特別是研究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蒙關係歷史就顯得尤為重要。

學界基於多國多邊檔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蒙關係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少之又少。中國台灣地區學者藍美華所著《澤登巴爾時期外蒙與中共的關係（1952 — 1984）》[1] 是為數不多的直接關涉研究，作者重點討論了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任內中蒙兩黨的黨際關係變化，並特別注意中蘇關係變化對中蒙關係變遷的影響，也關注到了蒙古自身主動性的作用。從學術史的脈絡來講，該書對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蒙關係史研究，無疑有着開拓性的參考作用。與此同時，該書仍有進一步的拓展空間，最重要的是材料，藍著所用史料多是《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2] 等中文易見文獻資料和一些關於蒙古史的英文整體性著作，對於中國、蒙古、俄羅斯等關涉方第一手的原始檔案資料基本沒有挖掘使用，尤其是俄羅斯和蒙古學術界

1　原中國駐蒙古大使黃家騄在其回憶錄中，對「蒙古」的地理和政治意涵有過概念界定：「蒙古原稱『外蒙古』或『喀爾喀蒙古』。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取得成功，7 月 11 日成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 年 11 月 26 日廢除君主立憲，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後於 1949 年 10 月 16 日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的蒙古稱為『蒙古人民共和國』。1992 年 2 月，蒙古人民共和國改名為『蒙古國』」。黃家騄：《五進蒙古：駐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實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04 頁。筆者贊同並在行文中實際參用了黃家騄的概念界定，只不過在論及當時當下時段的具體問題時，也會使用「外蒙古」等詞彙。

1　藍美華：《澤登巴爾時期外蒙與中共的關係（1952 — 1984）》，台北：蒙藏委員會編印，2000 年。
2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 年。

均出版了《澤登巴爾和他的時代》[1] 文獻集，作者也沒有用到。除此之外，筆者目力所及，中國學界再沒有直接關涉這一主題的研究專著。

蒙古國學界關於 1949 年後的中蒙關係史研究專著同樣不多。中國學者金泉曾專文對此進行過梳理，金泉認為，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由於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以及一些重要檔案史料尚未解禁等因素的影響，蒙古學術界對於蒙中關係的研究並未深入，80 年代開始，蒙中關係的專著方才陸續面世，「雖然觀點有失偏頗，但是開創了蒙古國對冷戰時期蒙中關係的研究」，90 年代初蒙古國實行民主改革，隨着蒙中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檔案史料的進一步解密，蒙古學術界開始以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思考冷戰時期的蒙中關係問題，相關成果多集中於蒙中政治關係等領域，並提出了比較客觀的觀點。代表性研究著作是蒙古國學者勒．伯格澤扎布（Л.Бэгзжав）的《蒙中關係（1949 — 1999）》[2]，主要以蒙古文檔案史料、官方文書和書報等文獻史料對蒙中近 50 年的政治關係史進行了梳理，觀點也較為公允，但是作者未能使用到蒙文之外的檔案材料。總之，除了部分的專題研究論文之外，蒙古國學術界研究 1949 年以來中蒙關係的專著同樣甚少，尤其是能夠使用到直接關涉方即中國和俄羅斯等多國多邊檔案的研究專著更是幾乎沒有，蒙古國學界更多的關注點還是外蒙古獨立問題。[3]

故而，總體而言，關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蒙關係的研究著作，主要集中表現在整體性蒙古史或者外交史以及通史性著作當中對中蒙關係的一般性描述。裴堅章、王泰平主編的三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4] 中對

1 *Леонид Шинкарев*. Цеденбал и его время: любовь власть трагед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1-2, Москва: Собрание, 2006.《澤登巴爾和他的時代》文獻集俄文版和蒙文版均已出版，俄文版為 2 卷本，第 1 卷為研究部分，主要介紹澤登巴爾的生平與作為；第 2 卷為檔案文獻資料，涉及 20 世紀 20 年代至 80 年代，是研究澤登巴爾時代蘇蒙和中蒙關係的重要參考資料。

2 *Бэгзжав Л*.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1949-199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9.

3 金泉：《蒙古國的蒙中關係史研究 ——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蒙古國蒙中關係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冷戰國際史研究》2017 年春季號，第 201-213 頁。

4 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 — 1956）》，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57 — 1969）》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 — 1978）》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 年。

1949 年後的中蒙關係都有所述及，對其間雙方發生的重大事件均能點到，基本限於對當時中蒙關係歷史的一般性概述，該書對梳理 1949 年後的中蒙關係有重要的線索參考價值。俄羅斯學者亞斯金娜（Г.С.Яскина）主編的《20 世紀蒙古史》[1]，在論及中蒙關係內容時，同蒙古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一樣，專闢一章對 1949 年後的中蒙關係進行梳理，也只是一般性的描述。類似的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也有，例如《20 世紀蒙古史》《現代蒙古史》[2]，等等。中國學者畢奧南主編的《中蒙國家關係歷史編年（1949 — 1999）》[3]，雖也屬於此種類型的研究，所不同的是該書採用了中蒙雙方「共識研究」的方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蒙古國科學院合作從中蒙兩國公開出版的報紙、年鑒等資料中選出內容，使用中蒙兩種文字以編年體大事記形式逐條彙編了中蒙建交 60 年的雙邊關係內容，其貢獻在於對中蒙雙方已公開史料的整理，能為研究該段中蒙關係歷史提供重要參考，而在對原始檔案的輯錄方面仍有較大空間。

近年來，隨着中國、俄羅斯、蒙古以及東歐各國檔案的不斷解密，學術界已經開始注意利用中蒙俄以及東歐解密檔案對 1949 年後的中蒙關係歷史進行研究，並呈現深入分析、視角多元的趨勢。但總體上仍處於研究的起步階段，多以學位論文和專題論文為主，在問題意識的深入挖掘、具體論證的多國檔案多方求證等方面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舉例諸如蒙古學者巴圖巴雅爾（Ц.Батбаяр）的《1950 年代初期至 1966 年莫斯科和北京角逐時期的蘇蒙關係》[4]，主要使用蒙古國解密檔案從中蘇關係變遷的角度探究蘇蒙關係，認為蘇聯和中國為爭奪在蒙古的影響力競相援助蒙古。俄羅斯籍學者謝爾蓋．拉琴科（Sergey S. Radchenko）的《「蘇聯在

1 *Яскина Г.С.*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ии.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ИВРАН, 2007.

2 Bawden, Charles R,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Praeger, 1968. Baab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3 畢奧南主編：《中蒙國家關係歷史編年（1949 — 1999）》，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 年。

4 *Батбаяр Ц*.Монгол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иод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екином// *Алтанцэцэг Н. и др.* Россия и Монголия: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на историю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в XX веке,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 2001. 需要說明的是，巴圖巴雅爾的這篇文章收錄在 2001 年出版的論文集《俄羅斯與蒙古：20 世紀相互關係歷史的新觀點》，該論文集由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所和蒙古國科學院合作出版，其中收錄的很多文章雖然論述對象為蘇（俄）蒙關係，但行文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中蒙關係內容。

亞洲最好的朋友」：中蘇分裂後的蒙古》[1]，同樣從中蘇關係變遷的角度探究蘇蒙關係，認為以 1967 年蘇軍進駐蒙古為標誌，蒙古成為了蘇聯同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關係方面全面對抗的「朋友」。匈牙利籍學者巴拉茲（Balazs Szalontai）的《共產主義援助與澤登巴爾時期的蒙古》[2]，重點研究澤登巴爾任內時期中、蘇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對蒙古的經濟援助問題。2006 年前後，中國外交部檔案館開始解密開放大批館藏檔案，中國外交學院的石紹湘即最早利用中國外交部館藏檔案完成了其碩士學位論文《中蒙關係分析（1949 — 1965）》[3]，該文雖主要從外交學的角度探討中蒙關係，但對中國外交部檔案的發掘使用無疑是開創性的。陳弢的《中蘇分裂與中蒙關係（1960 — 1966）》[4]，則利用德國和中國外交部檔案論述了中蘇分裂對中蒙關係的影響。金泉的《「政經分離」：冷戰時期中蒙貿易關係歷史考察》[5]，主要使用蒙古國檔案探討了冷戰時期中蒙貿易關係的流變及其影響因素，作者使用不少蒙古方面的檔案史料。同樣，蒙古國在華留學生敖坦（N.Altantugs）的博士學位論文《中蒙經濟關係與蘇聯影響：1949 — 1964》[6]，也是利用蒙古檔案討論了 1949 年後的中蒙經濟關係並重點討論了蘇聯因素在中蒙經濟關係演變中的影響作用。白林的《中蒙貿易關係的建立與初步發展（1949 — 1955）》[7] 則是充分發掘蒙古檔案材料論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蒙之間從彼此試探到穩步建立貿易關係的歷史過程。需要指出的是，2015 年和 2019 年分別有兩篇以中國工人援建蒙古為主題的博士論文獲得答辯通過，分別是那仁吉日噶拉的博士論文《中國工人援蒙建設研究（1949 — 1964）》和白林的博士論文《中國赴

1 So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The Mongolian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CWIHP Working Paper* №42, 2003.

2 BalazsSzalontai, "Tsedenbal's Mongolia and Communist Aid Donors: a reappraisal", IIAS News letter, #35, November 2004.

3 石紹湘：《中蒙關係分析（1949 — 1965）》，碩士學位論文，外交學院，2010 年。

4 陳弢：《中蘇分裂與中蒙關係（1960 — 1966）》，《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5 年第 4 期。

5 金泉：《「政經分離」：冷戰時期中蒙貿易關係歷史考察》，《冷戰國際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6 敖坦：《中蒙經濟關係與蘇聯影響：1949 — 1964》，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17 年。

7 白林：《中蒙貿易關係的建立和初步發展（1949 — 1955）》，《中共黨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1]，系統發掘了蒙古國關於中國工人援蒙的檔案文獻資料，並且詳盡述論了中蒙雙方圍繞該問題不同時期的往來交涉，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工人援蒙是透視 1949 年後中蒙關係變遷的一個重要視窗。旅美學者劉曉原新近發表了文章《中蒙關係「正常化」：一個政治現象的歷程（上）》[2]，劉曉原從「正常化」概念入手，指出兩個關鍵步驟 —— 1946 年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196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訂立邊界條約，使兩國的「正常」關係逐漸形成和趨於穩定，認為與中國其他周邊國家的關係相比，中蒙關係的歷史更為複雜。

可以發現，這些學位論文和專題研究論文有兩個特點：第一，就史料而言，已經開始使用到了包括中國、蒙古、俄羅斯、東歐等國家的解密檔案文獻，史料的發掘利用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第二，從所關涉主題來看，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工人問題、經貿問題、劃界問題，等等，而且如 1949 年後中蒙經濟關係問題的研究正逐步深入。而主要問題是受語言等因素影響，國外學者的研究對中國的檔案資料發掘有限，中國學者的研究對蒙古和俄羅斯解密檔案的綜合利用也有待進一步深入，同時也存在對中蒙關係變遷過程中，蘇聯和中蘇關係影響因素過度解讀，對中蒙各自在雙邊關係

1 達．那仁吉日噶拉：《中國工人援蒙建設研究（1949 — 1964）》，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白林：《中國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 — 1964）》，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中國援蒙工人問題，筆者也有兩篇專題研究論文，相較於那仁吉日噶拉和白林，筆者更多的是發掘中國檔案，尤其是地方檔案：谷繼坤：《中國工人「赴蒙援建」問題的歷史考察（1949 — 1973）》，《中共黨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Gu Jikun, The Intertwining of High-level Interactions and Low-level Exchanges: Chinese Workers in Mongolia from 1950 to 1964, *The China Review*, Vol. 19, №3（August 2019）.

2 劉曉原：《中蒙關係「正常化」：一個政治現象的歷程（上）》，《二十一世紀》（香港）2022 年 12 月號（總第 194 期）。劉曉原還就中蒙劃界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專論，劉曉原：《中蒙劃界史跡初探（上）——「同志加兄弟」的博弈》，《二十一世紀》2020 年 6 月號（總第 179 期）；《中蒙劃界史跡初探（下）—— 從兄弟到鄰居》，《二十一世紀》2020 年 8 月號（總第 180 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同角度涉及蒙古問題的文章，劉曉原：《「蒙古問題」與冷戰初期美國對華政策》，《歷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文章之外，作者還著有涉及蒙古的兩本書，雖然不是直接關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蒙關係的研究專著，但是其對於蒙古問題的整體性、宏觀性、理論性的視野關照，值得參考閱讀：Liu Xiaoyuan,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中的主動性研究不足等問題。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蒙關係歷史的研究之所以呈現出如此現狀，主要是兩方面原因所致：一方面，受長期以來的問題意識和關注焦點影響，關於蒙古問題的既有研究多集中於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外蒙古問題」，這點無論是中國學界、俄羅斯學界、蒙古學界，還是西方學界，多是如此。另一方面，還是受制於檔案文獻資料的瓶頸和限制，對於關涉 1949 年之後中蒙關係主題解密檔案的發掘利用工作還是明顯不足，檔案文獻的開掘不足，直接影響到對這一時期中蒙關係研究的推進。

具體而言，第一方面，學界長期以來對於蒙古問題的研究，除卻蒙元時期，多集中於民國時期的外蒙古獨立問題。實際上，從該問題甫一出現，諸如《申報》《東方評論》等報刊雜誌均給予了高度關注，並發表了很多時評性文章。[1] 時至今日，這些資料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中國學者涉及該問題的既有研究多集中於外蒙古 1911 年、1921 年、1945 年三次「獨立」的歷史。[2] 從研究者的結論來看，多從沙俄侵華、蘇俄推動「世界革命」、蘇聯以國家利益至上和 1945 年美蘇壓力以及斯大林、蔣介石的個人因素等方面探討不同時期的外蒙古獨立問題。從使用的材料來看，除有限的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檔案文獻資料之外 [3]，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的中華民國時期的外交檔案文獻是重要的史料

1 舉例如：《外蒙古獨立始末記》，《申報》1912 年 3 月 3 日第六版。高勞：《獨立後之庫倫及俄蒙協約》，《東方評論》1912 年第 9 卷第 8 期。錢智修：《俄人在蒙古之勢力》，《東方評論》1913 年第 10 卷第 3 期。《外蒙形勢變遷略史》，《東方評論》1920 年第 17 卷第 1 期。馬伯援：《蒙古之現狀及吾人今後之責任》，《東方評論》1921 年第 18 卷第 2 期。《外蒙古獨立之回想》，《申報》1924 年 8 月 23 日第五版。張忠紱：《中國與帝俄關於蒙古之交涉》，《東方評論》1943 年第 39 卷第 3 期，等等。

2 代表性成果有：劉存寬：《中俄關係與外蒙古自中國的分離（1911 — 1915）》，《歷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方美玲：《紛繁複雜的外蒙古第二次獨立》，《黨史研究資料》1997 年第 11 期。樊明方：《1911 — 1921 年的外蒙古》，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 年。欒景河：《外蒙古獨立與斯大林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第三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尤淑君：《蔣介石與 1945 — 1952 年的外蒙古獨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1 期。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5 年版，等等。

3 如陳春華編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

源 [1]。與中國研究者多將外蒙古獨立問題視為外蒙古自中國分離出去的歷史相比，早期蘇聯和蒙古學者多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從「共識研究」的角度，強調蘇聯和蒙古「兄弟般的友誼」，蘇聯為蒙古「1921 年革命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幫助、蘇聯對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給予了極大支持，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史》《蘇聯共產黨和蒙古人民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奮鬥過程中兄弟般合作的歷史經驗》，[2] 等等。不過，已經有蒙古學者開始注意運用多國多邊檔案從國際背景來討論外蒙古獨立問題，蒙古學者拉夫登·寶勒德（Равдангийн Болд）的《獨立和承認：在美國 — 俄國 — 中國三方利益中的蒙古（1910 — 1973）》[3]，即是將時段拉長來討論外蒙古的獨立和獲取國際社會的承認問題，更加注意國際局勢和背景的作用影響，作者是歷史學博士，曾在 2003 — 2007 年間擔任蒙古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使用了不少美國、蒙古和俄國的檔案文獻資料。對於同一時期的外蒙古問題，西方英語世界相關的研究學者有 G. 弗里特斯、R. 魯潘、O. 拉鐵摩爾等人，主要將外蒙古問題放置於 19 — 20 世紀上半葉複雜的歷史場域中考察，多認為俄國和中國對蒙古民族主義與國家制度的形成發展產生了很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強調指出了 1921 — 1945 年間外蒙古國際地位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並分析了造成此種現象的影響因素，此外，還提出了外蒙古作為蘇聯「僕從國」

1 呂一燃主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1917 — 191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 年。《中俄關係史料：東北邊防與外蒙古（192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年。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台北：國史館等，2015 年，等等。

2 *Ширендыб Б.*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21 года. М.: Наука, 1971.*Балдо Б.(гл. ре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брат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КПСС и МНРП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1.

3 *Равдангийн Болд*,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признание. Монголия в треугольнике интересов: США–Россия–Китай, 1910–1973,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15.

的「僕從主義理論」，等等。[1]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研究蒙古問題的學者當中，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是 O. 拉鐵摩爾，其本人曾多次前往中蒙俄邊界地區進行遊歷，能夠熟練運用多種語言文字進行交流和閱讀，研究出版了包括外蒙古問題在內不少關涉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著述。[2]

另一方面，關於史料，蘇聯時期出版了一些文獻資料集，如 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陸續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集》（第 1 至第 4 卷）和《蘇蒙關係（1921 — 1966）》，70 年代出版的《蘇蒙關係（1921 — 1974）》，等等。[3] 這些文獻資料集多是公開文件的史料彙編，包含着豐富的史實素材，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關涉到外蒙古獨立問題，近年來俄羅斯和蒙古學術界編輯出版了不少新的檔案集，有些甚至剛剛面世，這些檔案集所收錄的基本都是源自檔案館的檔案文件，具體有《聯共（布）文獻中的蒙古歷史（1920 — 1952）》（蒙文，三卷本，2002 — 2009）、《共產國際文獻中的蒙古（1919 — 1934）》（俄文，兩卷本，2012）、《俄蒙軍事合作（1911 — 1946）》（俄文，兩卷本，2019）、《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檔案文件中的蒙古（1921 — 1936）》（俄文，2019）。[1] 學術界對這些檔案集，尚未開展深入研究使用，如誠加利用，相信一定會極大促進外蒙古獨立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從已有的俄文和蒙文檔案文獻材料集來看，所涉主題仍是多集中於 20 世紀上半葉的外蒙古獨立問題和蘇蒙關係問題。對於 1949 年以來的中蒙關係問題關涉甚少。

所以，目前深化 1949 年之後的中蒙關係歷史研究的瓶頸在於資料，特別是檔案資料發掘不夠，利用不足，因而對模糊的歷史進程了解有限，亦難有深刻論述。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在與國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以及多次到蒙古國考察發現，其實蒙古國的幾家檔案館均藏有大量涉及 1949 年之後中蒙關係的歷史檔案，因而着力收集蒙古方面的檔案資料。如能發掘和利用這些檔案資料，無疑可以促進中國學者的研究深化，並據此建立中國學者對中蒙關係歷史的認知體系，從而大大推進中國的蒙古學和中蒙關係研究。

有鑒於此，自 2011 年以來，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周邊國家研究院）多次派人赴周邊國家收集對華關係或與中國有關的檔案和資料，其中涉及中蒙關係檔案收集的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展開：一、2014 — 2017 年，先後四次派人赴蒙古國查找和複製檔案文獻，主要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檔案館（МАХНТА）、蒙古國家中央檔案館（МУУТА）、蒙古對外關係中央檔案館（МУГХТА）和蒙古國家檔案局（МУАЕГ）開展工作，經過各種努力，終於複製相關原始檔案約 5000 餘件。二、蘇聯與中蒙關係關聯甚大，因此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各國家層級的檔案館裏，亦館藏有大量關涉中蒙關

1 Gerard Martin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ltslntem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1949. Robert Arthur Rupen, *Outer Mongolia Nationalism 1900-1919*, Thesis(Ph. 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4. Peter S.H. Tang, *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8. Jeanne Nickell Knutson, *Outer Mongolia: A Study in Soviet Colonialism*,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59. Robert Arthur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00-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此外，〔蘇〕馬．伊．戈爾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陳弘法譯，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年）可對了解 13 世紀至 20 世紀中葉西方的蒙古問題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和索引。

2 袁劍《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可對了解拉鐵摩爾及其關於中國邊疆的學術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該書附有 1920 年至 1983 年拉鐵摩爾的著述目錄，其中包括許多針對外蒙古問題的篇目。

3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Т.I-IV.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7-1961; 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1921-1966гг., Сборникдокументов. М., Наука, 1966; 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21-1974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1 *ДамдинсурэнС. ЖелезняковА.С.* МонголымтухайБХК（б）-ынбаримтбичигт（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эмхтгэл, Iботь（1920-193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ДамдинсурэнС. ЖелезняковА.С.* МонголымтухайБХК（б）-ынбаримтбичигт（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эмхтгэл, Iботь（1933-1940）,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5. *ДамдинсурэнС. ЖелезняковА.С.* Монголымтухай БХК（б）-ынбаримтбичигт（1920-1952）, Баримтынэмхтгэл, IIIботь（1941-195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КудрявцевиИ.И. ит.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34）. Часть I（1919-1929）,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НЦ СО РАН, 2012. *Кудрявцеви И.И. и т.д.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34）. Часть II（1930-1934）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НЦ СО РАН, 2012. *Козлов Б.В.Чулуун С.(отв.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1911-1946）, сб. док. в 2 ч., Москва: "Граница", 2019. *Орлова К.В.(отв.ред.)*, Монголия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з архивов ФСБ России（1921-1936 гг.）, сб. док. Москва: ИВ РАН, 2019.

係歷史的檔案文件。主要是集中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РГАСПИ）。特別是 2015 年華東師範大學周邊國家研究院承接了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進一步促進了此項工作的展開，具體蒙古方向，該項目集合了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上海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等高校的研究團隊，目前工作集中於檔案收集和整理，未來將推進在檔案收集整理基礎上的歷史研究工作。筆者也參與該項目團隊之中，本書所使用到的很多檔案文獻資料尤其是蒙古檔案資料也多是受益於此，特別表示感謝。當然，本書所涉文責概由筆者自負。

本書所用到的檔案文獻資料，主要包括：

一、出自檔案館的原始檔案，這是本書的核心史料和展開論述的基礎，包括外文檔案和中國檔案。外文檔案除了受益於參加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團隊檔案收集整理工作得以參考的蒙古檔案外，還包括筆者本人前往和通過委託他人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館（ГАРФ）、俄羅斯國家現代史檔案館（РГАНИ）收集的俄羅斯解密檔案。中國檔案包括中國外交部的部分檔案資料，其他諸如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等地方檔案館早先也解密開放了不少相關檔案，尤其中國工人赴蒙援建方面的檔案，這些檔案文件能夠很好地還原中蒙關係往來發展的很多具體細節。

二、除了盡最大可能收集檔案館原始檔案外，筆者也參考使用了一些檔案文獻集。2014 年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了 12 卷本《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雖然主題是中蘇關係，但收錄了不少涉及中蒙關係的檔案文件，比如涉及中蒙建交、中國工人援蒙問題、中蘇關係變遷的蒙古，等等。此外，2019 年俄羅斯和蒙古學者合作編輯出版了檔案集《蘇蒙經濟聯繫（1955—1985）》[2]，檔案文件的主題集中於蘇聯和蒙古 1955 年至 1985 年間在農業、對外商貿、經濟聯繫、經互會（СЭВ）機制框架下經濟合作等方面，這些檔案文件多出自俄羅斯國家經濟檔案館（РГАЭ），也包括部分俄羅斯國家檔案館（ГАРФ）和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以及布里亞特共和國國家檔案館（ГАРБ）、伊爾庫茨克州國家檔案館（ГАИО）、伊爾庫茨克州國家現代史檔案館（ГАНИИО）館藏的檔案文件，還有蒙古國一些檔案館的文件，雖然這些檔案文件的主題集中於蘇蒙關係，但是因為蘇聯對於透視中蒙關係的重要性，這些檔案文件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易見史料（含未刊史料）。具體包括有關領導人的年譜、文稿，《人民日報》《內部參考》《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報刊材料》《各國共產黨簡況》等公開和內部發行的報刊資料，部分中國外交官和新華社派駐蒙古記者的回憶錄、回憶文章以及蒙古方面出版的回憶紀念性文集[1]，等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主要由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年譜、文稿，如《毛澤東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周恩來年譜》《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聶榮臻年譜》，等等，有很多內容涉及 1949 年後中蒙關係發展變遷的重要節點，例如，1956 年是中國對蒙古經濟援助的重要年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就收錄了一份 1956 年 9 月 24 日毛澤東同蒙古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的逐字稿[2]，該份談話記錄約 5000 字，對於分析彼時中蒙雙方經濟關係有着重要參考價值。

在這些檔案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同時參考借鑒吸收前人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書的研究目標是，梳理 1949 年至 1968 年間中蒙關係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解釋此種歷史過程所呈現出的歷史現象，最後分析該時段內中蒙關係波折變遷的影響因素與經驗啟示。即筆者的核心研究寫作理念是，基於檔案

1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 年。

2 *А.В.Юрасов(отв.ред.)* Совет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1955-1985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Фонд Связь Эпох,2019.

1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 —— 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 一個前駐蒙外交官的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年。黃家騄：《五進蒙古：駐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實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8 年。蒙古國駐華大使館編：《友誼合作的一甲子 —— 中蒙建交 60 周年》，北京：京津彩印有限公司，2009 年。高樹茂主編：《中國和蒙古國的故事》，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8 年。

2 《同蒙古人民革命黨代表團的談話和印發談話記錄的批語》（1956 年 9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 213-223 頁。

文獻史料，梳理歷史過程、解釋歷史現象、推斷決策動機，並儘可能地分析歷史演進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歷史現象及其參與者尤其是決策者們的決策動機。

不過，本書主要不是進行理論問題的討論和分析。作為對這一課題的初步研究，本書的主要任務是對所收集的大量史料進行梳理、對比、考證和分析，從而把這段時期內中蒙關係的基本情況和脈絡搞清楚，說明這一時期內中蒙關係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和階段性特徵，總結中蒙關係發展變化的影響因素。

根據 1949 年至 1968 年中蒙關係發展的變化，以及發生在其間的一些重要事件，筆者把研究的內容分為五個時期，而本書也就大體依照中蒙關係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分為五章。不過，有些專門的問題在論述時會前後延展相對集中一些進行討論。

第一章，1949 — 1951 年。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掌握政權，尤其是 1919 年共產國際建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21 年，中蒙兩黨成立。可以說，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蒙兩黨就已經建立了黨際之間的聯絡關係，當然，這種聯絡關係並非指彼此派遣正式代表長駐對方中央委員會，而是指兩黨建立的實際溝通渠道，也就是能夠解決具體問題的渠道。只不過，這種渠道需要經過共產國際的協調，長期同處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並且處於革命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有不少受惠於這種黨際關係的例證。1948 年底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着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身份轉變，這種身份的轉變也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中蒙之間的關係有着新的考量。中蒙之間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古繼蘇聯之後，成為首批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但是，即便同處社會主義陣營，中蒙之間政治互信的基礎並沒有隨着外交關係的建立而有質的提升，一個直觀的表現是 1949 年 10 月 16 日中蒙建交，但是直到 1950 年 7 月雙方才實現互派大使。可以說，建交之初的中蒙關係呈現出冷淡而疏離的狀態，而過往彼此的認知糾葛是重要原因。而這種疏離狀態直到 1952 年才被打破。

第二章，1952 — 1954 年。1952 年是中蒙建交後的重要轉變之年。在這一年，雙方開始進行高層互訪，政治互信隨之不斷提升，兩國關係實現了初步發展。尤其是，195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三周年之際，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訪華，是年國慶，蒙古是唯一國家元首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觀禮的國家，中方也給了蒙古方面以很高的禮遇。最重要的是，中蒙兩國最高領導人實現了會晤，雙方開始直面歷史過往，在現實的基礎上討論和發展兩國關係。澤登巴爾此行訪華近 20 天，作為訪問中國的重要成果，中蒙雙方簽署了《中蒙經濟文化合作協定》，此後中蒙兩國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啟全面的合作與交流。

第三章，1955 — 1957 年。正如有學者研究指出，1954 年夏季至 1955 年春季，中國的亞洲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經歷了中蘇結盟及其之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後，中國領導人將「中間地帶」特別是其中的亞洲地區界定為重要的戰略空間。[1] 實際上，中蘇兩國領導人也早就有過討論和分工，認為中共應當履行對亞洲各國所應承擔的責任。[2] 這種「責任」隨着朝鮮戰爭的結束和中國更加注重同亞洲國家關係而得到落實。某種程度上，此種背景下，1955 年中國開始大規模援助蒙古，中國對蒙古的援助包括人力援助、成套設備技術援助、經濟貸款等方面。人力援助主要表現為各行業生產工人和技術人員援助，自 1955 年始，中國政府每年在蒙古的人力援助人數平均保持在 8000 人左右。與人力援助同步進行的是，中國在成套設備技術和經濟貸款方面向蒙古提供援助。成套設備技術方面基本是採取蒙古方面提出援助項目要求，中國政府完全「包建」的形式。經濟貸款則主要是中方向蒙方提供無償、低息貸款。1956 年中國向蒙古提供了首輪 1.6 億盧布的無償援助。當然，中蒙雙方圍繞援助問題的細節問題進行了多輪次的談判。中蒙兩國之間的國家關係也不斷升溫。

第四章，1958 — 1960 年。伴隨着中國對蒙古的大規模經濟援助，中蒙

1 牛軍：《重建「中間地帶」—— 中國亞洲政策的緣起（1949 — 1955 年）》，《國際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

2 沈志華：《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亞洲革命領導權的轉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

兩國關係不斷提升，步入「蜜月期」。蒙古對當時中國的內外政策也給予了整體的贊同和支持。首先，1958 年中國向蒙古提供 1 億盧布的貸款援助，這也是中國對蒙古的第二輪經濟技術援助。對 1958 年中國國內開展的「大躍進」運動，蒙古方面在 1959 年給予了公開支持和聲援[1]，並且在國內開展了學習運動[2]。其次，1959 年在中印之間發生的邊界衝突問題上，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訪問印度期間在新德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態，西藏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內政」，中印兩國邊界問題「應當由兩個友好的大國 —— 印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 自己來解決」。[3] 這很大程度上是在國際輿論層面對當時中國的聲援。這也使中共將蒙古黨視為可以爭取的對象。某種程度上，作為回應，中國則進一步加大了對蒙古的援助力度，1960 年中國政府再次向蒙古提供了 2 億盧布的貸款，這是中國對蒙古的第三輪經濟技術援助。中蒙兩國之間的國家關係也在這種互相的支持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960 年 5 月，周恩來訪問蒙古，雙方在烏蘭巴托簽署了一系列協議和聲明文件。蒙古黨中央機關刊物《黨的生活》為此發表專文，文章詳細介紹了中國對蒙古的援助和中國援助對蒙古建設發展的意義，指出周恩來此次訪蒙之行「使蒙中人民兄弟般牢不可破的友誼、緊密合作進入了新階段」，中國對蒙古的全面援助是「忠實的兄弟般的緊密合作的典範」[4]。

第五章，1961 — 1968 年。中蒙關係在這一段時期整體呈現出轉冷的特徵，兩黨黨際關係層面分歧由隱現走向加劇化和公開化，兩國國家關係在圍繞中國援蒙工人問題等方面齟齬不斷並最終走向惡化，蘇聯的作用和影響以及中蘇關係的惡化是導致這一時期中蒙關係發生波折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在中蘇分歧肇始初期，蒙古有過調節中蘇關係的主動性努力和嘗試，這種嘗

1 《蒙古「真理報」9 月 2 日評論「中國人民躍進的新成就鼓舞着我們」》，《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報刊材料》1959 年 9 月 3 日，第 39 期。
2 可參考白林、德力海：《蒙古人民共和國「躍進」運動的歷史考察（1958 — 1960）》，《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6 期。
3 新華社：《澤登巴爾和尼赫魯發表聯合公報重申堅信和平共處原則澤登巴爾在記者招待會上談中印邊界問題》，《人民日報》1959 年 9 月 17 日，第 5 版。
4 《蒙黨刊載文讚揚我對蒙的援助》，《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報刊材料》1960 年 8 月 10 日，第 388 期。

試在中蘇分裂之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無果而終，中蘇也確實都在爭取蒙古，蒙古最終選擇了站在蘇聯一方。具體而言，政治層面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於 1963 年 12 月致信中共中央明確表示在中蘇兩黨爭論中站在蘇共一方[1]。經濟方面 1964 年 9 月中蒙雙方關於在蒙中國工人問題的談判破裂[2]，此後中國工人陸續撤回中國，後續中國援蒙項目實際中斷，此後兩國的貿易額逐年走低，俄國解密檔案顯示，1962 年時中蒙之間的商貿流轉額為 2400 萬盧布[3]，此後中蒙之間的貿易額逐年走低，至 1966 年時為 239 萬盧布，到 1967 年時更是跌至 65 萬盧布的歷史最低點[4]。軍事上蒙古更是尋求蘇聯的直接庇護，1966 年 1 月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問蒙古，期間蘇聯和蒙古在烏蘭巴托簽署了為期 20 年的《蘇蒙友好合作條約》，該條約實際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締約雙方將在保證對方的防禦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締約雙方 …… 為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起見，共同採取包括軍事方面的措施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5] 也正因此，蘇聯駐軍蒙古一直是影響後來中蘇關係和中蒙關係「正常化」的一個極大障礙。進入 1967 年之後，隨着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和中蘇關係的影響，先後發生了蒙古驅逐三名中國華僑教師的「五一二事件」和蒙古駐華大使館用車被焚燒事件。[6]1967 年 5 月，《人民日報》首次刊出標題中含有「蒙修」字眼的社論。[7] 是年 10 月，蒙古政府將駐華大使撤回國內，中蒙外交關係降至代辦級。[8] 自此，中蒙關係轉入冰冷的「冰封期」。

1 《蒙古人民革命黨反華言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 年，第 88-89 頁。
2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決議：關於援蒙華工回國問題》（1964 年 8 月 28 日），МАХНТА, ф.4, д.28, х/н.86, хуу.53-59。《中蒙關係大事記》（1964 年 1 月 — 10 月），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6-00775-03。
3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商貿代表同蒙古駐中國商貿代表的談話紀要》（1963 年 12 月 6 日），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55, л.3。
4 《駐華商貿參贊報告：中蒙兩國 1968 年貿易狀況》（1968 年），МУГХТА, ф.38, д.1, х/н.917, хуу.17-20。
5 «Правда», 8, 12-18, января 1966г.РГАНИ, ф.80, оп.1, д.710, л.103-104.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 —— 一個前駐蒙外交官的回憶錄》，第 237 頁。
6 孫一先：《文革年代的中蒙關係》，《縱橫》2001 年第 1 期，第 23-25 頁。
7 新華社：《首都革命羣眾高呼「打倒蘇修走卒蒙修！」熱烈歡迎從蒙古歸來的華僑反修戰士》，《人民日報》1967 年 5 月 24 日，第 8 版。
8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 —— 一個前駐蒙外交官的回憶錄》，第 255-256 頁。

目

錄

叢書總序 /沈志華 —— i

序　言 —— iv

第一章 —— 001

起步：中蒙外交關係的建立
與雙邊事務的展開（1949—1951）

第二章 —— 051

提升：中蒙高層互訪
與政治互信的增進（1952—1954）

第三章 —— 101

發展：中國開始援助蒙古
與兩國關係不斷升溫（1955—1957）

第四章 —— 193

蜜月：中國持續對蒙古援助
與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1958—1960）

第五章 —— 260

轉冷：中蒙黨際關係的破裂
與國家關係的逐步惡化（1961—1968）

結　語 —— 291

「何以如此」：
對中蒙關係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的思考

參考文獻 —— 305

第一章　起步：中蒙外交關係的建立與雙邊事務的展開（1949 — 1951）

由於長期同處共產國際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和蒙古人民革命黨建立了黨際之間的聯絡關係，當然，這種聯絡關係並非指彼此派遣正式代表長駐對方中央委員會，而是指兩黨建立的實際溝通渠道。只不過，這種渠道需要經過共產國際的協調，並且處於革命黨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有不少受惠於這種黨際關係的例證。此外，1948 年底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着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身份轉變，這種身份的轉變也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中蒙之間的關係有着新的考量。中蒙之間就是在此種歷史背景之下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蒙古是繼蘇聯之後首批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但是，即便同處社會主義陣營，中蒙之間政治互信的基礎並未隨着外交關係的建立而有質的提升，一個直觀的表現是 1949 年 10 月中蒙建交，但是直到九個月之後的 1950 年 7 月雙方才實現互派大使。可以說，建交之初的中蒙關係呈現出冷淡疏離的狀態，過往彼此的歷史認知糾葛是重要原因。而這種疏離狀態直到 1952 年才被打破。

第一節　新中國新型對外關係原則的確立與中蒙建交

1948 年下半年至 1949 年 1 月，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主力被消滅，大陸解放已經勝利在望。與此同時，毛澤東在 1949 年新年獻詞中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提出年內將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宣告新中國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1]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已經將籌建新中國提上了議事日程。而建立什麼樣的對外關係原則和外交政策方針，怎樣處理舊中國尤其是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外交關係，是中國共產黨人亟需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

中共新型對外關係原則和外交方針的基本輪廓大體是在 1949 年 1 月至 3 月確定下來的。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了兩次重要會議，一次是 1 月的政治局會議，另一次是 3 月的七屆二中全會。1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文件，其中明確提到「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之一就是「決定外交政策」。[2] 從 1949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到 6 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發表了多次講話和報告文件，闡述了新中國對外關係的構想。[3] 在 3 月 5 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毛澤東明確說明：關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4] 3 月 13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指出：「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1]

1　新華社：《將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人民日報》1949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 — 9）》第十八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 15-22 頁。
3　如《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友好合作》（1949 年 6 月 15 日）、《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第 89-96 頁。
4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5 頁。

至此，中共「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主要對外關係原則和方針實際已確定下來。4 月初，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發表了《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聯合聲明》[2]。在這份由毛澤東草擬的聲明中公開點明了蘇聯是新中國的盟友。6 月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3]。與此同時，周恩來完成了新政協《共同綱領》[4] 的草擬工作，用法律語言闡述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這標誌着新中國新型對外關係原則和外交方針的制訂工作最後完成了。

總體而言，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進行和平建設爭取有利國際環境，根據當時面臨的國際形勢，整個 194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制定確立了以「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為主要指導方針的新型對外關係方略，執行和平的對外政策，為新中國開展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5]

新中國新型對外關係原則和對外政策方針的確立也為中蒙建交提供了背景和框架：一方面，「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新中

1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 — 1949）》第 26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 194-197 頁。
2　新華社：《中國各民主黨派聯合聲明反對北大西洋公約》，《人民日報》1949 年 4 月 4 日，第 1 版。
3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468-1481 頁。
4　《共同綱領》的具體內容，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第 283-317 頁。
5　周恩來後來對這些外交方針進行了更為系統的闡釋：「另起爐灶」，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而是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一邊倒」，就是明確「我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即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殘餘勢力。此外，周恩來還進一步明確了「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外交方針政策的內容。詳情參見《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1952 年 4 月 30 日），《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第 48-57 頁。

國新型對外關係的題中之意，蒙古正屬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列；另一方面，「另起爐灶」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係也是新中國新型對外關係的重要內容，而外蒙古獨立地位的獲得正是在國民政府時期實現的。[1] 因而，如何處理和解決形成於國民政府時期的外蒙古獨立地位的問題，不僅是蒙古領導人關心的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要議題。

實際上，早在 1946 年 2 月 22 日，時任蒙古政府總理和外交部長的喬巴山在同斯大林的會談中，即明確表達了其本人未來對於同中國關係問題的看法，此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已經同意了外蒙古獨立，但喬巴山仍然在會談中流露出了同國民政府建立直接關係的疑慮，強調不願意也不會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並詢問斯大林，是否能夠拒絕國民政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設立領事館。此次會談中，喬巴山也向斯大林提出了關於在內蒙古和興安嶺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問題。喬巴山通報了關於一些地區的蒙古遊牧點的情況，這些地區在地理位置上屬於中國的組成部分。按照喬巴山的意思，要在這些地區開展宣傳鼓動工作，以便準備把蒙古族居民從中國分離出來，歸入到蒙古人的境內，建立獨立的蒙古族國家。斯大林則提醒喬巴山如此「需要與中國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事實上不支持喬巴山的主張。[2] 此時期，藉助於 1945 年國民政府同蘇聯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已經獲得了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正式承認，[3] 但喬巴山仍然力圖避免國民政府在蒙古設立領事

1 關於 1945 年外蒙古獨立問題的相關研究，可參考方美玲：《雅爾塔協定和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黨史研究資料》1998 年第 1 期；尤淑君：《蔣介石與 1945 — 1952 年的外蒙古獨立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1 期，等等。

2 《斯大林與喬巴山會談紀要：外蒙古與蘇聯、中國的關係》（1946 年 2 月 22 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第一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 年，第 139 頁。

3 《蔣中正日記（未刊本）》（民國 35 年 1 月 5 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八冊），台北：國史館，2015 年，第 274 頁。

館。應當說，蒙古領導人對於中國方面的疑慮並未隨着國民政府承認其獨立地位而打消。也可以看出，喬巴山對內蒙古等地區的蒙古族遊牧點有着自己的考慮和打算。

蒙古歷史學者勒哈格瓦（Т.Лхагва）曾於 1990 年代初發表過一篇文章《斯大林對蒙古人有過什麼考慮》，文章援引了大量材料（但是勒哈格瓦所用材料並未註明出處，目前這些檔案材料都已經解密開放並能找到 —— 筆者註）談及了斯大林與蒙古歷任領導人歷史上的多次會談，並提出了評論。勒哈格瓦在文章中提到：從 1934 年起到 1949 年前後，斯大林同喬巴山至少會見了六次，長期以來，斯大林對於喬巴山在蒙古的政治地位給予了很大支持，「然久而久之兩『結盟兄弟』之間產生了矛盾，爭論和彼此誤解。其中之一便是將內蒙古併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據不確鑿的消息說，他們在 1946 年及 1947 年會見時曾提出這個問題，但喬巴山聽不進斯大林的正面答覆。」勒哈格瓦文章所說的「不確鑿的消息」，在目前俄國檔案大量解密開放的情況下，已經證實，即如上 1946 年 2 月斯大林與喬巴山的會談記錄。勒哈格瓦的文章表明，確有蒙古學者認為喬巴山對於內蒙古有訴求和主張。不過，與喬巴山針對內蒙古的訴求不同，勒哈格瓦還提到，喬巴山的繼任者澤登巴爾和當時的一些蒙古知識界的一些代表，對蒙古的未來有另外的考慮 —— 加入蘇聯，「澤登巴爾和蒙古知識界的一些代表從國家發展利益出發，提出犧牲蒙古獨立，將蒙古人民共和國併入蘇聯。」[1]

勒哈格瓦文章中提到的觀點和看法，事實上已經有不少俄國解密檔案能夠證實。1949 年 8 月 19 日，蘇聯駐蒙古公使普里霍多夫（Приходов）向馬林科夫（Г.М.Маленков）提交了一份關於蒙古內部局勢的報告，報告涉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地方民族主義和反蘇情緒的部分

1 *Лхагва Т.* Что же думал Сталин о монголах … ?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3, с.83-96.

表現、喬巴山在對待內蒙古問題上的情緒和其個人行為上的缺點、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澤登巴爾（Цеденбал）的有關情況。普里霍多夫在報告中指出，「喬巴山積極醞釀內蒙古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的想法，並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並不遙遠的前景。毫不誇張地說，喬巴山靠這個想法活着。」普里霍多夫認為「考慮到民主中國的代表對他們佔據的領土主權問題警惕性極高，政策也推廣到全部地區，喬巴山對內蒙古的意圖可能會引起不良後果」。普里霍多夫同時彙報了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的有關情況，「澤登巴爾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和蒙古領導層現在還未明確蒙古未來的發展前景。蒙古已經將國內所有發展國家生產力、文化、政治資源全部用盡，他認為蒙古實際上已經到了必須加入蘇聯的時候，因為它不具備自身發展的能力，而蘇聯對蒙古作為一個友好獨立國家的援助也不可能無窮無盡。」普里霍多夫同時指出，「澤登巴爾提出的這些想法 …… 蒙古加入蘇聯的問題在蒙古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人）中小範圍被提起 …… 喬巴山當時對此持否定態度。」普里霍多夫也在報告中表示不贊同澤登巴爾提出的蒙古加入蘇聯的想法。[1] 8 月 31 日，普里霍多夫的該份報告包括其個人的看法意見被以簡報的形式提交給了斯大林。[2]

後來，普里霍多夫在給葛羅米柯（А.А.Громыко）的報告中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具體圍繞着蒙古領導人對蒙古未來發展前景和道路的不同看法展開。普里霍多夫在此份報告中集中談及兩方面的事情：一方面，1949 年澤登巴爾與喬巴山就蒙古發展前景的問題有過一次談話，澤登巴爾當時表達的意思是按照他的看法，蒙古只有在加入蘇聯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向前發展，喬巴山當時對此持否定態度。現在澤登巴爾重新提出

1 《普里霍多夫給馬林科夫的報告》（1949 年 8 月 19 日），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80, л.9–24。
2 《普里霍多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49 年 8 月 19 日），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280, л.4–8。

該層意思，只是說他很難判斷目前的國際局勢是否允許提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蒙古小呼拉爾主席團副主席曾德（Цедып）藉口要商量一下有關根據新選舉制籌備和進行大呼拉爾選舉的一些問題來到了蘇聯駐蒙使館。「曾德真正意圖是想在可信賴的會談中表達對蒙古進一步發展前景的疑惑。」曾德對當時蒙古的發展情況非常憂慮，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蒙古非常落後，從實質上說是原地踏步停滯不前」，曾德認為蒙古要擺脫落後狀況「只有一條出路：最快速度地將蒙古併入蘇聯」。曾德表示，「許多人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他們暫時還不敢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因為這些觀點在『上面』可能得不到支持。曾德同時直截了當地說他所指的就是喬巴山，喬巴山的觀點是認為蒙古未來前景在於同內蒙古合併。曾德指出，喬巴山的『恢復統一志向』在他周圍的部分人中有些擁護者，但曾德認為這畢竟還是少數。」普里霍多夫在報告中也提到，「喬巴山將蒙古人民共和國整個未來與它和內蒙古的合併相聯繫。喬巴山真的是生活在這個想法裏，認為它是自己生命的目的並很少去思考在與內蒙古合併的情況下，蒙古的發展會有什麼樣的道路和機會。」普里霍多夫在報告中還提到一件事，「正在蘇聯高等學院學習的蒙古學生團體與兩名蒙古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一起遞交了寫給喬巴山和澤登巴爾的信。他們在信中請求對蒙古進一步發展前景的系列問題予以答覆。寫信者也竭力要證明最為正確的解決辦法就是蒙古刻不容緩地加入蘇聯。」[1]

可以看出，至少在當時，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蒙古領導層對於蒙古未來的發展前景一直存在着兩種觀點：一種以喬巴山為代表，主張將內蒙古合併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一種以澤登巴爾和曾德等領導人為代表，主張蒙古加入蘇聯。從目前筆者能夠看到的俄國檔案資料來看，蘇聯

1 《普里霍多夫關於蒙古的發展前景和發展道路問題給葛羅米柯的報告》（1950 年 9 月 13 日），АВПРФ, ф.0111, оп.32, п.215, д.3, л.17–26。

方面彼時對於蒙古領導層的這兩種想法和觀點都未給予明確支持。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在關注和努力嘗試解決蒙古問題的可能。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與中央檔案館聯合主辦的刊物《黨的文獻》曾於 1995 年第 6 期和 1996 年第 1、3 期刊登了一組檔案文獻[1]，這組檔案文獻的主題是 1949 年 1 — 2 月米高揚和毛澤東的祕密談判，檔案來源為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ПРФ）特藏檔案，由原蘇聯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列多夫斯基（А.М.Ледовский）[2] 提供，中國學者李玉貞組織編譯，列多夫斯基的這組檔案文獻實際上更早發表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遠東問題》雜誌 1995 年第 2 和第 3 期[3]，《黨的文獻》發表的是俄文譯稿。這組檔案文獻材料對於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領導人就蒙古問題的考慮和蘇聯的態度以及中蒙建交後初期的關係狀態有着重要參考作用。而且這組檔案源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又經過《黨的文獻》雜誌編組發表，因而是可信的，不過，正如雜誌編者所指出的，這組檔案文獻是由米高揚 1960 年 9 月提交給蘇共中央的，結合當時的中蘇關係情況，米高揚報告中有些內容，經中國中央檔案館的查證，還是與史實有所出入的。而且，如何看待其中涉及的問題，也要放置於當時當下的歷史環境中去考慮。

1 列多夫斯基：《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祕密談判（1949 年 1 — 2 月）》上、中、下，李玉貞編譯，《黨的文獻》1995 年第 6 期、1996 年第 1 期、1996 年第 3 期。

2 列多夫斯基因其曾經的駐中華民國大使和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身份，能夠接觸到大量核心的俄國檔案材料，其本人也有很多研究研究著述，並在中國學界廣為傳播。如，列多夫斯基：《1949 年在南京與黃華的三次談話》，陳鶴編譯，《中共黨史資料》2005 年第 4 期。列多夫斯基：《馬歇爾使華與蘇中美關係》，陳春華譯，《中共黨史資料》總第 73 輯（2000 年 3 月）。列多夫斯基：《蘇聯、美國與中國的人民革命》（節譯），馬貴凡譯，《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13 輯。列多夫斯基：《毛澤東同斯大林書信往來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列多夫斯基：《斯大林給中共領導提出的十二點建議》，馬貴凡譯，《中共黨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尤其是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等譯，新華出版社，2001 年，該書經常為中國黨史和國史研究者參引。

3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96-111; №3, с.94-10.

《黨的文獻》刊載的這組檔案文獻顯示：1949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8 日，米高揚（А.И.Микоян）曾祕密訪問當時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並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談及蒙古問題時，米高揚有如下記敘：

> 關於蒙古。毛澤東主動問，我們如何看待內外蒙古的統一。我回答說，我們不支持內外蒙古的統一，因為這會使中國喪失很大一塊領土。毛澤東說，他認為外蒙古內蒙古可以統一起來，歸入中國的版圖。對此，我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早就享有獨立權了。抗日戰爭勝利後，連中國政府都承認了外蒙古的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擁有自已的軍隊，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經濟正在迅速發展前進，它早就體驗到獨立的好外，恐怕什麼時侯也不會自願放棄獨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與內蒙古聯合起來，那結果大概是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蒙古國。談話時在座的任弼時在這個時侯插話說，內蒙古有三百萬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萬人。斯大林針對我就此事的報告給我發來一個電報，供毛澤東參考，內稱：「外蒙古的領導人主張中國境內各地蒙古族人與外蒙古聯繫起來，在獨立的旗幟下建立一個統一的蒙古國。蘇聯政府反對這個計劃，因為它雖然並不威脅蘇聯的利益，但它意味着從中國割出一大塊領土。我們認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聯合為一個自治單位，外蒙古也不會為了在中國政府的版圖內實行自治而放棄獨立。不言而喻，這件事的決定要屬於外蒙古。」毛澤東知悉這個電報後說，他會考慮這個電報，還說「他們當然不會維護一種大漢族沙文主義的路線，也不擬提出關於蒙古統一的問題」。[1]

1 《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祕密談判（1949 年 1 — 2 月）》（中），《黨的文獻》1996 年第 1 期，第 94 頁。